

中国乡村现代化的 回顾与前瞻

● 陈光金 著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彭兆平

装帧设计:宋名辉

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

陈光金 著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375

ISBN7—5438—1353—X

F·209 定价:23.80 元

序

陆铿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从那时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明显地，这150年可以分成三个基本的历史时期或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0年到1949年，长达一个世纪。这是一个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兴起和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的时期，在此期间，列强侵略掠夺，军阀割据混战，人民饱受荼毒，这样一种严酷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中国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

第二个阶段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终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30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走了一条与前一百年迥然不同的道路，这一条道路的实质，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加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它的原型，就是前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在这一阶段，尽管道路崎岖曲折，中国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工业化运动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功绩，即在中国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具有现代水平的城市大工业体系，实现了我国城市从前现代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要说这30年的现代化道路完全照搬了前苏联的模式，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早在50年代中期，我国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模式的许多矛盾，提出要改革的设想。但其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形成了，要改也难。再加上我们又发动了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经

济建设和现代化因此而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计划经济体制留下来了，但经济效率极端低下，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还留下了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遗留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存于农业和大量人口滞存于农村的严重问题。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宣布了这一现代化模式的不成功。

1978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相对于上一阶段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要在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同时，实现农村现代化，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则是如何把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以及如何把大量农村人口城市化。就工作难点和中国现代化的特点而言，现阶段中国现代化实际上主要就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而合适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合适的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对中国而言，西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和前苏联模式都不是合适的道路。同样，依靠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由城市来带动乡村，在现阶段的中国也不现实。我国的城市改革滞后，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还仅仅是一个勉强自我维持的系统，连自身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也未完全解决好，或者准确地说，还需要靠继续吸取农业剩余来维持自己，像京津沪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几个城市能够对乡村产生辐射力或所谓极化效应，这种情况终是特例。因此，中国的农村现代化总的来说就只能主要依靠农村，依靠广大农民自身，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与乡村应当继续隔离。

十多年来，中国农民正是以其巨大的创造力，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着自我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以农民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地进入市场经济领域从事商品生产与流通、创办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以及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而为世界所瞩目，形成了中国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为全世界的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前苏联以及中国前30年的政府统制型

模式，它的真正主体是亿万中国农民自己，它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令人鼓舞，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它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问题和困难无疑是客观存在的——都值得人们关注。

这本题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的书，不失为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历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性的探索，在对世界现代化的几个成功模式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作了历史追溯和理论反思后，这本书从自己的认识出发描述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所取得的奇迹般的伟大成就，但作者并未停留在对这一奇迹的简单的因果陈述上，而是进一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理解，比较全面地剖析了存在于这个奇迹产生的过程中的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难题。作者经过自己的分析后指出，中国农村现代化经过十几年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现在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日益密切，人财物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庞大而频繁，城乡各自继续封闭地发展已经不再可能，因而在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模式和政策取向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抉择，需要新的创造，尤其是制度和组织的创新。

这本书的落脚点其实是中国乡土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但它用了一半多的篇幅来深入地探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背景、进程、影响、难题、出路和前景，提出了自己的有特点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它认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是农村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根源，一方面，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亦即广大农民作为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又总是伴随着或者说需要社会文化以及农民人格结构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意味着上述诸方面的同时完成。因此本书以其鲜明的逻辑一贯性强烈地吁求一种整体性的、体现社会公平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或现代化模式，并且结合广大农民的创造性实践为这

种模式进行了自己的探讨，不管其成就如何，这种探索本身都是一种重要而有益的尝试。

这本书的作者陈光金是我的学生，他出身农村，始终真切地关心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个所谓的“三农问题”，并且对问题的所在有他自己切身的体认。在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到再次走进校门成为我的学生之前的七八年里，他又用了近乎一半的时间不断地对农村进行实地考察，积累了有关“三农”问题的大量一手材料和感性认识，这为他写成这本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我期望，这本书能给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的现状和前景以及进一步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帮助。

1995年12月

目 录

导言	(1)
一、理念分殊：什么是现代化	(1)
一、未能归一：乡村现代化道路的国际比较	(10)
三、西学东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论争与抉择	(33)
四、水到渠成：乡土中国的现代化	(55)

上篇 产业结构与经济现代化

第一章 土地的价值	(71)
一、有土有财：一个千年的梦想	(71)
二、制度改革：背景与契机	(78)
三、边际效应：超常增长及其限度	(85)
四、鱼与熊掌：土地情感的沉浮	(97)
第二章 市场经济的基础范围	(109)
一、农商本末：观念的冲突与变革	(109)
二、市场农业：比较效益与结构调整	(118)
三、蛛网陷阱：小生产、大市场及其他	(126)
四、走出困境：寻找进入市场的快车道	(141)
第三章 农业制度创新与土地经营规模	(154)
一、超小规模：螺丝壳里的道场	(154)
二、制度创新：没有第二个小岗	(167)
三、土地租赁：重构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关系的 尝试	(175)
四、股份合作：产权与利益的明晰归属	(181)

五、主体再造：农业规模经营的探索与实践	(186)
第四章 坎坷的道路——乡村工业的兴起	(202)
一、发展战略：历史性的选择歧误	(202)
二、栉风沐雨：农村工业化的前史	(214)
三、异军突起：半壁江山入彀中	(226)
四、卓尔不凡：农村工业化的支柱	(232)
第五章 时代的奇迹——乡村工业化的机理	(245)
一、生存压力：奇迹的多元动因	(245)
二、结构松动：奇迹的制度背景	(255)
三、超常供给：奇迹的要素条件	(262)
四、体制灵活：奇迹的内部机理	(277)
第六章 奇迹的超越——乡镇企业的终结	(298)
一、山重水复：发展的困境与难题	(299)
二、产权改造：结构转换与技术进步的新趋势	(317)
三、重新定位：乡镇企业的升级、转换与终结	(333)

下篇 社会结构与文化现代化

第七章 进城、造城与农村城市化	(353)
一、二元格局：农村城市化的背景与难题	(353)
二、人口过剩：农村城市化的压力	(362)
三、走南闯北：现代民工潮	(372)
四、模式选择：乡村城市化的政策取向	(389)
第八章 社会分化与结构转型	(410)
一、人口更替：增长、结构与素质变化	(413)
二、多元主体：社会架构的大漂移	(421)
三、自愿团体：社会构造的新形式	(431)
四、异分异构：身份、地位与阶层的分化	(447)
第九章 文化嬗变与人格转型	(470)

一、家庭平等：权力结构的调整	(472)
二、利益原则：行为模式的选择	(485)
三、契约理性：公民人格的孕育	(497)
四、文化定位：多样化及其演进	(513)
第十章 生活方式的流变与传统农民的终结	(524)
一、收入增长：生活基础的变构	(524)
二、消费转轨：从生存走向发展	(534)
三、时空变构：生活坐标的组合	(547)
四、多维整合：传统农民的终结	(564)
后 记	(577)

导 言

今日中国现代化的主战场是乡村而不是城市，这是 150 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所造成的整体格局。回顾这 150 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我们真切地感到，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政治上获得新生的唯一选择，那么我们选择的这条现代化道路，却不完全拥有这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尽管由于现代化本身内涵丰富且复杂多样，以及每一个尝试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各不相同，因而确实存在着各不相同的可能选择。幸运的是，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尝试与挫折后，乡土中国终于在这个世纪的 80 年代走上了真正由自己创造的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并且进入了起飞前的助跑阶段。

一、理念分殊：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颇多争议的概念。自从本世纪中期人们提出这个范畴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便纷纷从本学科视野出发，对现代化的内涵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在经济学家眼里，现代化是经济发展或增长的代名词。尽管一再有学者对于把诸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收入的增长作为基本的或唯一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合适性提出怀疑，但是“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又把经济增长归结为人均收入的逐渐增长”的观念，“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从古典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到后结构主义经济学一

脉相承”^①。当今之世，国民收入的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工业化的道路，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铁打的事实，于是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把现代化与工业化联系起来，甚至“把发展和增长主要当作工业化。有些经济学家对工业化和发展不会或故意不加区别；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罗斯托，又把工业化与发展混同于西方化”^②。在美国学者C·E·布莱克等人看来，非生命动力的利用程度就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准，他们给现代化下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③我国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社会进步过程在特定的历史区间里采取了工业化的形式”。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即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工业化进程”^④。

与经济学家不同，社会学家的视野似乎更广阔一些。他们也承认，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但与此同时，他们倾向于“把社会置于注意的中心，因此，一个现代国家的鲜明特色就被视为大众教育，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制化以及快速

①②克芬德·阿克：《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它有无前途？》，转引自S·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③ C·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④ 参见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的通讯和交通等”。^①著名发展社会学家胡格韦尔特综合社会学中主流学派结构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西方的现代化实践,提出了如下一些“国家发展指标”:城市化、成人识字率和职业培训、报纸发行量、政治民主(多党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定期的政府更迭)、创业自由、世俗化、社会流动、职业分化、自愿团体的数量、民族统一、核心家庭模式以及独立的司法制度^②。胡格韦尔特的这份指标清单几乎囊括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另一位曾经因《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为新权威主义提出理由而在中国引起轰动的政治社会学家S·亨廷顿,则尤其致力于阐明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内涵,根据英克尔斯和史密斯的归纳,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表现为以下三个过程:“以一个单一的、非宗教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代替分散的、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威;新出现的政治职能——法律的、军事的、管理的和科学的职能——必须由新的行政科学组织来执行,该科层组织是基于成就而不是先赋(ascription)来选择人员;整个社会中的各个社会集团更多地参与政治,同时伴随着新的组织(例如政党和利益群体)的发展,来动员这种参与。”^③广义地看,亨廷顿的这三个过程的内涵,实际上是深刻的文化变迁。

但文化变迁不仅表现在客观的社会政治层次上,也会表现在微观的社会心理、个人态度以及人格结构上。因此社会心理学家们也大量地介入了对人的现代化的理论探讨。马克斯·韦伯被认

①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和戴维·H·史密斯著:《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台湾学者金耀基就把“现代”的内涵规定为以下六个方面: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高度的普遍成就取向。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88~93页。

②③胡格韦尔特著,白桦、丁一凡编译:《发展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第20页。

为是探讨人们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的首位学者，尽管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现代化”、“现代性”这样的概念。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他赢得了不朽的名誉，在这部书里，韦伯把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出现和发展归因于新教的伦理与价值观。在另一部书里，他甚至断言，亚洲的儒教传统远远不适合于产生资本主义^①。当然，韦伯不可能提到“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在他的著作中，只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当学者们把韦伯的观点当成对现代化的某种认识时，便有意无意地把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演进联系在一起或者甚至把二者等同了，就像罗斯托那样。当代社会心理学对有关人的心理态度、价值观的现代化理论作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与阐述。在这里，现代化被看作是“理解、表现和评价方式的改变过程”^②。丹尼尔·勒纳在其名著《传统社会的消逝》中把“现代化”所要达成的“现代”定义为“主要是一种心态——进步的期望、增长的倾向以及使自我适应于变迁的准备”^③。E·E·哈根相信，“经济理论不能给经济增长提供什么解释，广阔的社会与心理上的考虑才是恰当的”，因为“当传统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时，高度的技术是无法生根的。追求技能的进步得有生活方式的转变”^④。R·N·贝拉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即现代不应只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心

①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和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 21 页。

③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P61.

④ E·E·Hag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1962, P8、18。

态”^①。至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本人，在这个方面更是旗帜鲜明地把现代性看作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经济学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现代性，政治家以有效的管理制度来衡量现代性。我们的意见是：如果在国民之中没有我们确认为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多久。在当代世界的情况下，个人现代性素质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它们不是派生于制度现代性过程的边际收益，而是这些制度得以长期成功运转的先决条件。现代人素质在国民之中的广为散布，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之物，而是国家发展本身的基本因素。^②

他们给人的现代性规定了 12 条特征，并主张分 10 个主题来分析研究人的现代性的形成^③。

不能否定，社会心理学家们对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维度的研究是富有成果和启发意义的，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人的现代化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社会政治都还很传统的环境中展开、进行。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是等到人已经具备了所谓的现代性以后才开始，因此，现代化毋宁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在现代化的后发国家，

① Robert · N · Bellah: Meaning and Modernization. 转引自阿列克斯·英克尔斯与戴维·H·史密斯著《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 20～21 页。

②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第 454～455 页。

③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 25～39 页。

甚至人的现代化是在像工业化这样过程早已开始后才被启动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不是内生的变化，而是在外力冲击下发生的变迁，当然在这样的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往往因为社会政治以及人的现代化滞后而受阻。

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现代化与工业化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就共同之处来说，一是手工劳动为机械操作所代替从而实现技术创新或技术革命；二是伴随而来或同时发生的各级生产组织变革和各层次经济机构的调整和变动，从而实现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三是作为结果，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转化为以机器或其他现代化生产工具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就不同之处而言，首先在内容的范围上，现代化远比工业化广泛，工业化主要指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即技术的变革，而现代化则还包含了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革，其次从时间上说，现代化远比工业化久远。工业化只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而现代化则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长河。^①张培刚总结道：“工业化首先表现为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变革；然后表现为这一过程所引起的并且必然伴随而来的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最终必然会导致并表现为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上的变化；……另一方面，社会制度或经济体制也将会对‘工业化’的实现产生重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因情况之不同而对它起着推进、延续或阻碍的作用。”^②

以研究世界现代化问题著称的罗荣渠教授对此有着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广义地说，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现代化指

① 参见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同上书，第193页。

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促使传统的农业化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主义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引起深远的变化。^①张琢教授在讨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时，则尝试把诸如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产业结构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人口控制、教育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生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目标都纳入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范畴，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工业化则始终是核心和主导。^②

上述几种视野，或者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无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些有意无意地把现代化看作是“经济的现代化”，即社会所产生的单位资本与货物的“量的增加”的经济学理论，如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关系论等，一般在新兴国家都倍受青睐。一些对后发国家作过深入研究的学者指出，许多这样的国家的发展目标，首要的是“经济”，次要的是社会，最不重视的是政治，它们往往以为经济的发展是万应灵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像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因为按照库兹涅茨的据说为经验证实了的理论，收入分配差距，将伴随人均收入的增加，先是逐渐拉大，直到一个顶点，然后就会缩小。理论上的陈述几乎把这条倒U型曲线当成了自然而然的现实过程，而实际上收入的公平分配总是离不开国家的控制。结果除了少数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台湾）收入分配的差距没有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

① 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参见他新近的有关著作。

② 张琢：《中国现代化若干目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而拉大（此即所谓“反库兹涅茨效应”）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收入分配日趋不公，差距越拉越大。与此同时，在政治上，也没有像一些现代化的设计者们想象的那样，随着经济上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南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被西方国家扶持起来的所谓民主政府，都先后被军人或非军人独裁政府所取代了。新加坡的经济是高度发达的新兴工业国典型，但在政治上，这个国家却很难说是民主的。因此，台湾学者金耀基先生评论道：“不幸的是，地球上绝大多数的新兴国家都怀抱着这种‘经济的现代性’的观念。因此，现代日甚，离民主也日甚。这是今日‘现代化’运动中的一项潜在危机。”^①

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单纯的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偏向，因而在理论上更为完备，尽管像英克尔斯等对人的现代化的意义强调得有些过分。但是，理论上可以追求的完备，在实践中却可能是乌托邦似的幻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能否在如张琢教授所列举的那么多方面——我们认为完整的现代化的确包括了这些方面——同时启动并同步展开？如果不能，那么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来说，它所选择的从某个方面突破的特殊现代化道路是否真的与它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相符合？这种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代价最少，阻力最小的？某一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后，其他方面是否能自然跟进？（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看突破口选得好不好。）那么多问题的存在，充分表明，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要选择好一条恰当的现代化道路，并不那么容易，迄今为止，真正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后发国家屈指可数，就是一个明证。

还有一些问题，是整个现代化概念本身所必须解决的。例如，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